

# 20世紀的美國

The United States of Twentieth Century

港台修訂版 資中筠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目 錄

香港版序	1
總緒論	5
第一章 概論	35
第二章 在自由競爭與追求平等的悖論中擺動	67
第三章 進步主義運動	97
第四章 小羅斯福“新政”及其後	151
第五章 60年代的反抗運動及其他	181
第六章 公益基金會與捐贈文化的獨特作用	217
第七章 美國良心的負擔——黑人問題	255
第八章 移民、教育與人口素質	291
第九章 福兮？禍兮？	339
第十章 “9·11”之後	381
後 記	411
參 考 書 目	431
名詞及重要主題索引	439
譯名對照表	445

## 香港版序

本書最早是作者與陳樂民共同策劃並主編的《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的第一部，於 2000 年由三聯書店（北京）出版，由於初版比較匆忙，有一些疏漏和錯字，2001 年經過修訂，又出第二版。《冷眼向洋》是對 20 世紀的回顧，分美國、歐洲、俄羅斯、國際政治四部分，由四位作者撰寫。2007 年，三聯書店將四部分別單獨出版，但仍標明屬於《冷眼向洋》書系，美國部分經過較多的增補，命名為《20 世紀的美國》。2018 年 6 月，又經過增補修訂，由商務印書館（北京）出版。現在蒙香港中和出版社建議出繁體字版，以饗香港及海外讀者。

最初起意寫這樣一部書是得到汪道涵老先生的啟發。1997 年作者與陳樂民訪問上海時，意外地蒙汪老通過華東師範大學的馮紹雷教授約見。那是因為他讀到了陳樂民主編的《西方外交思想史》，因此想見見作者。老先生愛讀書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以他的高齡和高位，涉獵那麼廣，令人敬佩。我們談的話題很廣，總的還是圍繞世界

大局的發展和走向。其間，汪老提到，20 世紀行將結束，發生了這麼多重大事件和變故，真該好好總結一下。這只是一句感慨的話，並非是向我們提建議，要我們去做這件事。但是這也正是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在與汪老談話後，這個題目逐漸在我們的思想中突顯出來。我們三人各有所專：美國、歐洲、俄羅斯，在長期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宏觀的、全局性的心得，這三大塊確實對 20 世紀的走向起了重大的影響，我們何不真的來總結一下呢？此事的發起者是陳樂民，很快得到資、馮二人的同意。醞釀一段時期後，我們逐漸有了大致的想法。後來又有當時社科院歐洲所的一位青年研究人員自願加盟，撰寫第四部關於國際政治的內容。最後就有了《冷眼向洋》。它完全沒有作為甚麼“課題”“立項”之類，純粹是作者自願的結合。

這個題目很大，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視角，我們只能就各自所熟悉的領域選擇某個切入點，由果求因，希望能從社會發展的既成事實中找出一些規律來，不求面面俱到，主要是探討影響 20 世紀整個世界局勢的幾股主要力量的消長及其根源，以及明顯加快步伐的全球化的大趨勢及其種種悖論。盡量透過科技、經濟、政策、制度等外層的硬殼，深入到歷史、思想、文化的軟核心。

由資中筠執筆的“總緒論”中提出的切入點是人類的兩大基本訴求：發展與平等，它們形成了社會變遷、國家興衰的兩大動力。就一個國家、一種社會而言，所謂成功或失敗主要不在於政權在誰手中，或是疆土的擴大或縮小，也不是單純的數字的增長或減少，而是要看相對來說，哪個能更好地滿足人類的這兩大訴求，同時較好地解決或至少緩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對平衡的進展，從而達到真正的興旺發達，否則反是。事實上，對 20 世紀的發展起重大作用的思

潮在 19 世紀中期已經形成，不過在 20 世紀得到了最大規模的實施。可以說，整個 20 世紀給各種思潮提供了登場表演的歷史大舞台。這是貫穿於整個寫作思路的主要脈絡。

以上是關於最初起意撰寫回顧 20 世紀的著作的交代。提到汪老的啟發，這是事實，不敢自專，並非據以自重。事實上，整個規劃和寫作過程中我們並未向汪老彙報或請教過，最後的成果也未必是汪老所設想的那種總結，這是必須說明的。

本書主要寫 20 世紀的美國如何達到繁榮富強，成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對 19 世紀末、21 世紀初略有涉及，但它們不是主題。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國門重新開放以來，國人對外部世界關注最多的還是美國。有關美國歷史與現狀的研究和著述林林總總，作者不可能盡讀，因此不敢以哪些內容和觀點屬於“獨家”自詡。不過，作者有自己的視角和關注點，至少在寫本書時，很少見於其他論述，大概有以下幾點：

1. 重視 20 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改革，並以較多篇幅介紹；
2. 提出衡量美國興衰的標準及其緣由；
3. 提出美國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權可以並行不悖；
4. 解釋為何興起於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始終不能成氣候；
5. 對美國何去何從以及對世界禍福的影響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冷眼向洋》初版於世紀之交，在 2007 年《20 世紀的美國》單獨出版時，增加了一章“9·11”以後的美國。如今又過了十年，三聯版也已脫銷多時，不斷有讀者來問。自己重讀之下，似乎基本事實和論點尚未失效，最後的分析和不算預言的展望並未過時，敝帚自珍，感到還是值得重版，以饗新一代的讀者。本書定位為 20 世紀的美

國，21 世紀以來尚未成為歷史之事，不是本書的主題。很多事還需要時間的淘洗，拉開一段距離觀察，才能看清，具備深入探討的條件（至少對本人是如此）。但對於過去 10 年美國發生的許多令世界矚目之事又不能完全視而不見，所以最後加了一篇“後記”，代表作者迄今為止的認知。

如今繼 2018 年商務版之後，在香港出繁體字版，內容基本不作變動。有所不同的是，由於時格勢禁，商務版未收入“總緒論”，並對 2007 版個別地方有刪節，現在都予以恢復。另外，《後記》的結尾作者根據一年來新的認識，略作了一些改動。

資中筠

2018 年 8 月

## 總緒論<sup>1</sup>

站在世紀之交的門檻，人們紛紛回顧這百年來的曲折里程和繽紛世界。從加長鏡頭的萬花筒裡看：人們看到了令人驚歎的科學發明和技術的進步，從高度工業化到後工業化，到如今人人掛在嘴邊的“信息時代”、“數字經濟”，乃至使人充滿疑慮的可能改變整個人類生殖規律和倫理觀念的“克隆”術；轉一下，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血流成河，殺人無數，幾個世紀人類的成就毀於一旦，同時又看到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勞在戰爭的廢墟上迅速恢復和建立起了新的家園；再一轉，是代表人類頂尖智慧的科學家發明的原子彈的蘑菇雲，各國競相製造，目前武器庫裡的核武器足以毀滅人類幾次而有餘，

---

1 原為《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書系總緒論。《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書系由資中筠、陳樂民主編，共四冊，從美國、歐洲、俄羅斯、國際政治四個角度，回顧 20 世紀世界文明發展、大國政治變化和全球化趨勢。書系總緒論由資中筠撰寫，其中的觀點和論述對閱讀本書不乏重要參考價值，特收錄於茲，以饗讀者。本文完成於《冷眼向洋》初版前，文中事實及數據都截止於 1999 年，以後未曾修訂。

端賴尚存的自律意識和互相制約的機制迄今得以避免大規模運用；再一轉，是驚心動魄的十月革命，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升起在遼闊的歐亞大陸，全世界革命者歡呼嚮往，發展成“陣營”，而後激烈震蕩，分化解體，鐮刀錘子旗變成了三色旗；再一轉，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洶湧澎湃，幾個世紀的殖民體系徹底崩潰，聯合國從成立之初的 50 個國家發展到 186 個，而後是一些國家和地區（主要在亞洲）經濟起飛，舉世矚目，一些國家（主要在非洲）在內亂和貧困中掙扎；再一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關係中的新發明：“冷戰”，這既是傳統的大國地緣政治的搏鬥，又是兩種制度兩種思想體系的較量，只見兩個武裝到牙齒的超級大國角逐、對峙，忽而劍拔弩張，忽而握手妥協，最緊張時似乎要把全世界拖入一場核浩劫，但是每次都及“熱戰”的邊緣而返，而後，一個超級大國突然以敵友都始料不及的方式退出角逐，至今在掙扎中謀求新生；再一轉，“冷戰”結束後世界不太平，在“全球化”呼聲高漲中民族個性、民族要求、民族宿怨突顯出來，惡性膨脹，熱戰頻起，特別是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和中心的巴爾幹半島，到世紀末竟然又是烽火連天，代表當今最先進的科技和生產力、掌握最大的實力和財富、擁有殺傷力最強的武器庫的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十幾國聯軍在這彈丸之地傾瀉了除核武器外的迄今使用過的最先進的炸彈，今天的巴爾幹再次成為西方列強和已經大大削弱但餘威尚存的俄羅斯的明爭暗鬥的場所。世界人民憂心忡忡地看着這一為強權政治所打開的潘朵拉之盒還將造成怎樣的後果。

當然，在這萬花筒中，中國也構成了一幅獨特的長卷：世紀初正是甲午戰爭之後緊接着義和拳之亂招來八國聯軍，處於屈辱苦難的



最底谷，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戰亂、革命、內憂外患、“城頭變幻大王旗”、封閉、開放、跌到、奮起，到世紀末達到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成為人們在談論 21 世紀時的中心議題之一。今後中國的浮沉和走向不可避免地要對世界局勢發生重大影響。

## 對發展與平等的追求

面對這樣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紀動畫，企圖作一番深入的反思，從中找出規律性的啟示來，洵非易事。本書作者們（按：指《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書系作者——編者註）最初想探討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美國何以興，蘇聯何以衰？另一個問題是明顯加快步伐的全球化的大趨勢及其種種悖論，特別是當前民族矛盾突顯的現實，應該怎樣理解？再進一步說：為甚麼 20 世紀資本主義不但沒有如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所預言的那樣走向腐朽、滅亡，卻反而又有了新的發展，繼續顯示其生命力？為甚麼曾經令全世界勞動人民和進步知識分子雀躍歡呼，無限嚮往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曾經是一時之雄的超級大國，竟在 70 年後訇然解體，幡然易幟，作為一種制度在這一大大片歐亞大陸上受到嚴重挫敗，作為其主體的俄羅斯八年之後還沒有走出困境？“全球化”這個詞可能不見於馬恩經典著作，但是“工人無祖國”，“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自由人的聯合體”等等命題已經包含這層意思。今天，我們卻看到各國的社會結構都發生了，或正在發生着極大的變化，傳統意義的各國無產者沒有團結起來的跡象，而資產者卻以各種形式聯合起來，這是怎麼回事？這些問題經常縈繞於幾乎所有稍微關心世界形勢的人的心中，迷面

很簡單，迷底卻極為複雜，而且仍然存在多個探討的角度。實際上這兩大問題既是不同的問題，在深層次又有內在聯繫。我們盡量透過科技、經濟、政策、制度等等外層的硬殼深入到問題的軟核心來探討，大體上形成了本書的思路：

綜觀 20 世紀的社會變遷，歸根到底有兩大動力，一是求發展，一是求平等。前者導致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飛猛進，後者導致改良和革命。當然社會發展的進程從幾千年前就已開始，但是那種激烈競爭，不進則退，速度就是生命，擴張為本能的發展方式則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此有精闢的闡述。這種方式當然不始於 20 世紀，卻是在 20 世紀達到最大的覆蓋面，把所有獨立的國家都捲入其中。至於平等的要求，則並非“自古以來”就有的。人總是嚮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各個時代，各個階層的人心目中幸福的標準不同。在舊王朝制度下，以血緣為基礎把人分為等級因而權利也按等級分配，被視為天經地義，平等並不列入基本的幸福觀。直到 18 世紀歐洲啟蒙思想提出天賦人權的觀念，亦即每個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轉讓的基本權利，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並且成為革命的動力。到了 20 世紀，這種思想向東傳播，導致中國和俄國兩個大國最後王朝的崩潰。此後在主要的文明大國中，不論還有多少王權和貴族制度的殘餘，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反對各種不平等的表現成為正當的權利。於是，從某種意義上講，就一個社會內部而言，“發展和平等”成為 20 世紀的兩大追求。但是這二者又充滿了悖論。在科學技術、物質生產以空前的加速度前進的同時，社會矛盾也空前地尖銳化。各種企圖解決矛盾的傳統的和新的學說和模式仍然不外乎在這兩大追求

之間尋求側重點。無數思想家、政治家和實踐者提出各種理論和方案來解決其所包含的悖論，有時成功，有時失敗。即使成功也是相對的，新的矛盾又在新的水平上出現，如此往復，人類文明得以進步。就一個國家，一種社會而言，所謂成功與失敗主要不在於政權在誰手中，或是疆土的擴大和縮小，也不是單純的增長數字，而是要看相對來說，哪個能更好地滿足這人類的兩大要求，同時較好地解決或至少緩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對平衡的進展，從而達到真正的興旺發達，否則反是。事實上，對 20 世紀的發展起重大作用的思潮在 19 世紀中期已經形成，不過在本世紀得到最大規模的實施。可以說，整個 20 世紀給各種思潮提供了登台表演的歷史大舞台。

## 自由與平等的相悖與相成

毋庸贅言，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本主義使人得到全面解放，釋放出來空前的創造力。接下來歐洲獨領風騷幾百年，令人驚歎的科學發明層出不窮，藝術文化絢麗多彩，同時思想家輩出，各種主義、學說紛紛登場，百家爭鳴，形成燦爛輝煌的思想史，物質和精神文明都達到前人無法想像的高度。總括起來，在實際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廣義的自由主義。其基本出發點是：通過個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創造財富中得到充分發揮以達到全社會進步，這是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思想基礎，也是其結果。它的理想的程序是：先從各個不同的個人和群體所追求的特殊目標和價值出發，通過個人的努力和創造，然後轉化為人類普遍的進步和繁榮。問題是，在現實中並非全社會所有人群都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同步共同

富裕，或者至少向着一個方向前進。自由市場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潤，其中必然包括激烈的競爭和淘汰，每一個人為達目的，都不惜犧牲他人，不斷製造“受苦受難”的人群，於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平等正好成反比的現象。

這種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互為因果，促使生產力大發展，給人類帶來空前的進步和繁榮，同時也帶來巨大的、新的苦難，受益者和受害者日益壁壘分明，對後者說來，日益不堪忍受。於是而有各種從受害者出發的學說和解決方案。從費邊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到空想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各顯身手。這些主張都關心弱勢群體，而手段不同。總的說來，一種是在自由主義框架內的改良，一種是徹底推翻舊制度重建新的發展模式的革命。這裡應該說明的是，在實踐中改良還是革命，往往不是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而取決於客觀形勢，實際上取決於統治者有沒有足夠的意願進行適時的、順應發展需要的改良；也取決於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習慣的行為模式。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無數次民眾起來推翻現政權的暴力革命，絕大多數都符合列寧的名言：“統治者不能按舊的方式統治下去，人民不能再按舊的方式生活下去”。換言之，也就是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本書的主題不是討論革命和改良的歷史條件，而是試圖總結 20 世紀的廣闊的歷史舞台上兩大發展模式的實踐經驗。

這裡首先要把一些概念交代清楚：有些論者往往把自由與平等對立起來，似乎自由主義是不要平等的。這是誤解，是把經濟上的“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與整個自由主義等同起來，或者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代替了自由主義的全部。另外，美國自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之後，出現了新的語義上的變化，“自由主義”成為關注平等，

主張政府干預經濟，加強福利政策這一派的思潮，或稱為“新自由主義”；而“保守主義”則是指強調自由競爭，偏於放任主義，在政策上向投資者傾斜這一派。這是美國政治特色的產物，不能就此成為“自由主義”完整的定義。本書提到的自由主義如果不加說明，主要指從 16 世紀的英國肇始，經過歐洲大陸啟蒙運動的充實、豐富起來的經典意義上的理性自由主義，它包括自由和平等兩個方面。因為人生而平等本來是自由主義最基本的信仰。

洛克說：“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法國《人權宣言》第一條就是：“在權利方面，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國的思想先驅們也是自由與平等不分家的。傑佛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說得明白：“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

後來隨着社會的發展，不平等現象日益尖銳，於是出現了不同的支派，其中一派影響較大的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基本上不承認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經濟壓迫，認為既然大家都在同樣的規則中競爭，那麼失敗者主要是自己無能。他們要爭取的是取消種種導致不公平競爭的外部條件，包括政治特權、對四大自由的限制等等。但是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興起的同時，在自由主義者內部已經有各種改良的主張和理論，其關注點都是社會弱勢群體，致力於緩解不平等現象，反對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不能說這些人就不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都信奉基本的天賦人權。社會主義則與自由

主義屬於不同的思想體系，前者先集體後個人，後者反是。不過社會民主主義可以與自由主義並存，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專政學說與二者不相容，但是其關於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人的創造力，以及最終目的是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些思想卻是繼承和發揚了歐洲的古典理論。

### 各種理論在歐洲與美國的實驗

以上這些學說都興起於或完善於 19 世紀中期，但是在 20 世紀得到最大規模的實踐或實驗。歐洲仍是首當其衝的花色品種最全的實驗場：除了傳統的自由主義根深葉茂外，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歐、馬克思主義在歐亞大陸加東歐、乃至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都佔領過舞台，對千百萬人的命運產生過影響。其中法西斯主義帶來的是純粹的災難，並已徹底失敗。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並存基本站住了腳，至今仍在不斷適應、磨合、改革中。以馬克思主義名義實踐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受到了挫敗，但並不等於馬克思主義本身失去了生命力，相反，仍是世界公認的經典學派，並且是不斷地研究、詮釋和發展的對象。

20 世紀最大的，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實驗場是美國。從精神資源而言，美國的一切都來自歐洲，是歐洲文明的繼承者，又是其變種。在源於歐洲的種種學說中，經過美國土壤的選擇，得以生根開花的是自由主義。由於先天沒有封建制度的歷史包袱，自由市場經濟在這裡得到最無制約的充分發展。南北戰爭之後，亦即從 19 世紀最後的 30 年起，美國可以說是張開翅膀高速向前飛，把歐洲拋在後

面。在這過程中，創造了空前巨大的生產力，而且財富高度集中。此時剛好斯賓塞的理論傳到美國，為美國當時的實踐找到理論根據，立即受到熱烈歡迎。社會達爾文主義誕生於歐洲，但是在那裡生不逢時，因為當時的歐洲社會矛盾已經尖銳到難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同時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想對它更為適合。這樣，自由主義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派始終成為美國的主流思潮之一，也是其社會發展的主要經線。這一派強調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干預；重視機會均等而不顧或較少顧及結果的平等；崇尚私有經濟，主張限制國有；對福利政策心存疑慮……等等。但是如果只有這一條線，發展下去必然使美國變成一個弱肉強食的大森林，使矛盾激化到無法緩解的地步，難免引起社會動亂乃至革命。美國自南北戰爭以後，歷經經濟和社會危機而得以平穩發展，是因為還存在另一條線——改良主義的思想，也就是關心弱勢群體，傾向平等，主張政府調節經濟，實行福利政策的思潮。整個 20 世紀，美國一直不斷在進行漸進的改良，這是美國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強項，在這過程中，政策在上述兩端之間擺動、微調，而大的趨勢是二者都向中間靠攏。到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社會保障和福利網，同時自由市場經濟仍然高度發達。如果說，歐洲的福利制度更多受社會民主主義影響的話，美國則主要是“新自由主義”。也可以說，歐洲自由與平等並重，而美國始終是先自由後平等。如果以“左”“右”來劃分，則美國的社會思潮重心比歐洲更靠右些。

20 世紀西歐國家和美國都沒有發生革命，只有群眾運動和政府改良，也正因為有了及時的改良才避免了革命，這是其共同點（這是指一國內部，至於歐洲的兩次大戰和國家間的衝突，以及殖民地的

獨立鬥爭則是另一範疇的問題)。並非是西方國家的統治者天生比較明智，而要歸功於社會批判的傳統。這種批判的動力是知識階層的責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論自由。因此，“不平則鳴”得到充分的發揮，任何社會不公和黑暗現象都得到不斷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強有力的輿論監督。即使是代表各種利益集團的政客的互相揭短、攻擊，客觀上也起監督和制衡作用。由於政府領導是民選的，他們既不能壓制輿論，又不能置之不理，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過來，這種改良和妥協也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使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延續，所以既得利益階層也有進行這種改良的動力。在這方面，得天獨厚而又遠離戰場的美國得到最充分的體現，收到最好的效果。又由於它始終以自由市場經濟為主線，較之歐洲尾大不掉的高福利制度政府負擔不那麼沉重，平等與效率的矛盾也不那麼突出。當然在美國，這些問題也是存在的，令歷屆政府頭痛。於是在世紀末，英國貝理雅和美國克林頓同時提出了“第三條道路”之說。這一提法不出自保守派而剛好出自工黨和民主黨之口，究其實質是從原來的立場向右靠攏，而不是相反。從目前來看，這在思路上未始不是一種新的探索，但在實踐中仍然屬於微調，是否能成為漸變的改良的一個新階段，尚未可知。

關於平等，也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機會均等，也就是在起跑線上平等；一種是結果平等，也就是縮小貧富差距。自由主義宣揚的是機會平等，但是初始機會的平等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做到。歐洲資本主義是脫胎於封建社會，許多貴族轉變為資本家，並非同屬赤貧的人在完全同等的機會下競賽。相對來說，美國在開發初期機會比較平等，第一代來自歐洲的移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在廣闊天地各顯



神通。但是到美利堅合眾國建國時有產者和無產者之分已經很明顯，儘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先來者有權制定對自己有利的立法要後來者遵守。發展到 20 世紀，片面強調起跑線上的平等的虛偽性日益明顯，而結果的不平等日益尖銳。單靠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對解決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都不是靈丹妙藥。正因為如此，才有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乃至馬克思主義出現，其理想都是通過某種制度達到一個公平的社會，使人人都享有幸福。

### 沙俄 → 蘇聯 → 俄羅斯

毋庸贅言，一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改良，無論是機會還是結果的平等都不可能徹底解決。這一點早已為實踐所證實，馬克思主義又在理論上作了最完整的論述，不但提出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科學的必然規律的論斷，而且進而提出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取消了私有財產的制度，才能消滅階級，消滅人剝削人，從而達到真正平等、民主的理想社會。馬克思設想這一革命應該首先發生在資本主義最發達最成熟的歐洲國家，如英國。但是歷史的實踐是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的暴力革命發生在經濟相對落後，橫跨歐亞大陸的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幅員遼闊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俄羅斯民族是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優秀的民族，19 世紀的俄羅斯人才輩出，其文化與西歐相比有其獨特的風韻。當時的俄國知識分子思想極為活躍，也是百家爭鳴，學說蜂起，並且貢獻出了

“intelligentsia”這樣一個有特定含義的詞來概括有獨立思想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但是與幸運的美國人不同，俄羅斯民族是在苦難中成長的，底層是農奴制，頂上是專制的沙皇統治，不存在自由主義的傳統。本書系俄羅斯分冊以“東西方文明結合部”來概括俄羅斯的特點，包含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如本文一開始提到，是實行漸進的改良還是暴力革命，就其直接推動力而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是取決於統治者和人民群眾的習慣兩個方面，那麼，俄羅斯在這兩個方面改良的條件都不具備，暴力革命終究有其必然性。凡是通過暴力革命確立的政權，開頭必然要有鎮壓反抗力量的過程；何況，十月革命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剝奪一切資產者的革命；何況，其理論就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更何況，當時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極度恐慌，聯合進行武裝干涉，聲稱要將其扼殺在搖籃裡。由於列寧逝世較早，論者慣於把蘇聯的專制鎮壓以及一輪又一輪的排除異己的黨內清洗都歸罪於史大林的偏執狂。史氏個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論的、制度的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否則就無法解釋為甚麼是史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甚麼人成為最高領導，也無法解釋為甚麼全黨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幫助他的高壓統治。

考察蘇聯 70 年的業績，最大的成就是實現了相當高度的工業化、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普及教育。這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能對反法西斯戰爭作出巨大貢獻，並在戰後成為能與美國抗衡一時的超級大國的基礎。但是取得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價太大，從長遠看難以為繼。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與原來理論上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馳。

首先看平等，這本是馬克思主義對勞動者最有吸引力之處，也是

在理論上徹底革命優越於形形色色的改良之處。但是如眾所周知，在蘇聯最初物資極端匱乏的幾年中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之後，就逐步形成實際上的特權階層。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為突出。這種特權滲透於政治權利、職業選擇、經濟生活，乃至日常消費品的享有等各個方面。既無機會平等，也就談不到競賽規則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產積極性。西方社會的貧富不均狀況尚留有一條個人通過奮鬥向上爬的道路，在這過程中同時有所創新，為提高社會生產率作出貢獻。而在蘇聯被歪曲了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個人改善境遇之道在於在政治認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個社會生活領域中設法沿着階梯向上爬，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卻較少與創造性的勞動相關，甚至相反。對廣大的底層勞動者而言，儘管形式上憲法賦予無比的權力，實際上得不到保證，也難以有爬上上層的機會。結果，在社會結構上形成了廣大的勞動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的上層官僚機構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再看生產力的發展，革命的基本目的是解放生產力。蘇聯在成立之初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實現了工業化，建立了重工業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藉助這一制度較快地在廢墟上恢復經濟。但是這樣一種計劃經濟從根本上講是難以持續的，其浪費和無效，弊病百出，已為大家耳熟能詳，不必贅述。更重要的是，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人的解放和創造力的發揮。俄羅斯的勞動者不可謂不勤勞，而且以能吃大苦、耐大勞著稱；俄羅斯到 20 世紀初已經有高度發達的文化，擁有大批才華出眾的知識分子；前面提到革命後的蘇聯在普及教育方面的成績，直到今天，前蘇聯各共和國的人民普遍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在發達國家中也是比較高的。但

是，僵化的計劃經濟制和分配制度無法刺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高壓下的思想禁錮磨損了知識精英的創造性和獨立思考能力，很難想像大批有思想有頭腦有學識的精英長期處於動輒得咎，被迫說假話，連生命的安全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一個民族能夠興旺發達。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後的情況在蘇聯或者沒有實現，或者發生了異化。原設想，工人革命第一步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然後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個無產階級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在蘇聯的實踐中，工人革命奪取政權成功了；剝奪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也做到了；但是上面黑體字的內容卻沒有出現，實際上生產工具掌握在以國家的名義壟斷一切的特權階層手中。生產力遠遠沒有解放，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淪為機器的奴隸的工人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原來批判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設想無產階級革命後將享有更加高度的民主，但是除了革命最初年代的一些努力之外，相當長的時間中對民主的理解與慾求要麼化為無政府主義的“民眾崇拜”，要麼形成高度集權下的“愚民暴政”。30年代後蘇聯當政者口中“民主”一詞用得不比西方少，卻更加虛偽。平等既沒有實現，“自由”更成為禁區。結果，“自由”、“民主”的專利權送給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當然，與《共產黨宣言》理想中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更是背道而

馳。可以說，無產階級革命被異化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威力和蘇聯式的革命恐懼推動了美國和西歐各國的自上而下的改良；另一方面，對於這些國家中不滿足於改良，嚮往更為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步人士來說，蘇聯的實際榜樣的出現反而使理想破滅，使他們二害相權取其輕，轉而與現制度中的改良妥協。對於美國為甚麼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西方學者提出了若干解釋，都言之成理。本書作者又加上兩說：一是“反面榜樣”說，即上述蘇聯的實踐的負面效應；二是“時間差”說，即歐洲資本主義矛盾尖銳到難以為繼，為社會主義思潮提供土壤時，美國的發展正方興未艾，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提供土壤。等美國感受到危機時，漸變的改良已經開動，為“新自由主義”打下基礎。美國的強盛又挽救和支持了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二戰後，如果沒有美國，在筋疲力盡的歐洲國家會不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如法國、意大利的共產黨是第一大黨，又掌握強大的工會。這又是歷史的假設，難有定論。不過根據西歐深厚的自由主義傳統，又有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政策，即使發生較為激烈的社會動亂，大約比東歐更難建立蘇聯模式的專政。

## 東西方的較量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自一誕生起，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仇視和包圍之中，這種情況一方面造成了國民的凝聚力，和對國內各種物質的和精神的艱苦條件的耐受力，成為一種刺激團結奮鬥的力量；另一方面，使統治者有不實行民主，進行高壓的藉口。史大林

時期被清洗、遭迫害的對象大多數的罪名中都有“帝國主義間諜”，就很說明問題。二戰後的冷戰促使蘇聯進行昂貴的軍備競賽，導致國民經濟畸形發展，消費品長期緊缺，犧牲人民的生活質量。這種情況又形成悖論：軍備競賽使國家經濟不堪其負擔，而維持國內的凝聚力又需要外部的緊張局勢。事實上，蘇聯是經不起緩和、鬆動，經不起“和平競賽”的。一旦與西方正常來往，不再處於敵對的狀態，人民就有所比較，就失去必須忍受原來的條件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赫魯曉夫的“解凍”和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都對蘇聯的解體起了催化作用，也不無道理。而這正說明蘇聯的凝聚力實際上已經相當脆弱。

在我國，認為蘇聯解體是西方“和平演變”的成功之說頗為盛行，由此推理，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有限的開放就都是開門揖盜，是罪魁禍首。那麼反過來，在外部世界突飛猛進，進入信息時代的情況下，這樣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聯邦，照舊經濟上國家壟斷，政治上全面專政，對內實行思想禁錮和信息封鎖，對外保持緊張關係，抵制思想文化滲入，加緊控制東歐各國，嚴守柏林牆，能長期繼續下去嗎？更重要的是能給蘇聯及其勢力範圍內的人民帶來繁榮昌盛，幸福生活嗎？誠然，在冷戰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促變”是既定方針，是美國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的大戰略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其對外政策的“終極關懷”。這是公開宣佈的“陽謀”，同時也不排除使用陰謀顛覆手段，不過主要是陽謀。所以在東西方談判中，西方力爭的是文化交流和信息相通的自由，蘇聯方面力拒的也是這一點。1975年赫爾辛基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簡稱“歐安會”）達成的最後文件是妥協的產物：蘇聯得

到的是西方終於承認歐洲各國的邊界“不可侵犯性”，特別是承認奧得—尼斯河為德波邊界線；而西方得到的是蘇聯同意把“尊重人權”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人員自由來往的條款寫入文件。前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蘇聯佔領的領土問題，實際等於承認蘇聯的勢力範圍，利害關係很好理解；而文化、人員交流本是平等的，互相的，為甚麼西方力爭而蘇聯力拒呢？為甚麼蘇聯同意了就是給了西方便宜呢？因為蘇聯正確地看出西方意圖以思想文化滲透促“和平演變”。那麼，再進一步，既然是相互交流，為甚麼蘇聯不能對西方進行“演變”呢？不應忘記，共產主義從理論上就公開宣佈以推翻一切資本主義制度為目標。在實踐中，十月革命後各國紛紛成立共產黨，都聽命於共產國際，也就是聽命於蘇共中央。在國際主義的前提下，各國共產黨的忠誠首先是對“國際”，其次才是對本國。因此，西方國家的統治者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繼邱吉爾喊出要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扼殺在搖籃裡”之後，美國掀起過兩次反共高潮，一是 20 年代的“恐赤潮”，二是 50 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都是以蘇聯威脅的名義矛頭指向本國人民。說明當時西方統治階級缺乏自信，感到一種威脅。但是後來在思想上攻守之勢易位，害怕演變的就不是西方了。為甚麼年輕的蘇維埃政權頂住了十四國武裝干涉，卻在發展成掌握核武器的超級大國之後害怕在對等基礎上的和平的思想交流？事實上，在冷戰期間蘇聯“文攻武衛”齊上，陽謀陰謀並用，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爭奪勢力範圍，特別是新興的亞非拉國家，也是不遺餘力的。包括美國共產黨在內的一些國家的革命政黨接受蘇聯的資助也是公開的秘密。所以問題不在於在互挖牆腳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關鍵還在於誰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本國人的創造力，

滿足本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需要。因此本書系的主要篇幅放在討論幾大體系的內部發展上。

本書系俄羅斯分冊提到了兩次歷史的選擇：第一次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是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突變；第二次 1991 年解體也是突變，雖未經流血，卻也是造成社會激烈震蕩，十分戲劇性。這與美國漸進的改良成鮮明對比。所謂漸進的改良，也可以稱之為自覺的“和平演變”。那麼俄羅斯有沒有走和平演變的道路的可能？例如第一次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否必然要發生，克倫斯基政府是否有可能站住腳？若然，俄羅斯有沒有可能沿着議會民主道路發展資本主義？其結果會如何？第二次，到了 80 年代末，蘇聯是否還存在漸變的可能？聯邦的解體是否是歷史的必然？在經濟改革上，人們對“休克療法”議論紛紛，但是到了這個地步，是否存在像中國那樣漸進的改革的條件？當然，對已經發生的歷史是很難有假設的，不過在探討問題時也不妨作一些假設。從俄羅斯分冊的論述來看，作者馮紹雷傾向於歷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說東西結合部的文明造就了俄羅斯的特點，發展到本世紀初，社會結構中沒有中間階層，各種矛盾激化的程度使得客觀上議會改良難有成功的餘地。到戈爾巴喬夫時，一切已經太遲，戈氏實際處於進退兩難之中，回天乏術；葉利欽及其謀士們也決不是無能之輩，不能認為他們就是無視本國條件盲目追隨美國經濟學家的指導。局外人很難體會在那種積重難返的經濟體制中決策者所面臨的艱難選擇，也許俄羅斯人民命中注定要經歷大起大落。當然這是從既成事實向後推理，但是設身處地很難想出另外的道路。

在蘇聯解體和俄羅斯易幟之時，西方伸出雙手歡迎，一方面一個勁敵消失了，一方面歐亞大陸這一大片將納入“民主化”進程。相當



多的俄羅斯人也這樣看，以為從此可以與西方共享民主、自由和繁榮。然而事實決不那麼簡單。外援遠遠少於期望，如杯水車薪；內部改制步履維艱。原來與西方國家在地緣政治上的矛盾又逐漸恢復，而此時抗衡的力量已經大大削弱。西方國家一方面必須維持俄羅斯不能垮台，一方面乘人之危，把北約的邊界東擴到了它的腳下，而且肆無忌憚地用兵於東歐僅存的尚屬俄勢力範圍的南聯盟，俄羅斯周圍再沒有傳統的緩衝地帶。俄羅斯手中仍然握有僅次於美國的強大的核武器，卻已形不成足以使其有所顧忌的威懾力量，除了加強抗議，給予人道主義救濟外，保護不了要求加盟的難友。如果說，命運特別眷顧美利堅，總是給予有利的歷史機遇的話，那麼這個有深厚的文化積澱，創造過燦爛文明的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卻是命途多舛，20世紀的歷程更是悲劇性的。下個世紀能否擺脫新舊包袱，終於走出困境獲得新生，尚在未定之秋。在世界全球化過程中俄羅斯在何處定位，扮演甚麼角色，也難以逆料。但可以確定的是，一個以歐亞大陸文明結合部背景為制約的俄羅斯既不可能復歸前蘇聯的“社會主義”，也不能被“全盤西化”。

### “新時期的特點”

歷史的階段並不一定是按世紀分的，國家內部的歷史階段也不一定與國際關係的階段相一致。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還是19世紀國際政治的延續，新時期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開始。其標誌如下：

一、歐洲的“兩化”：“邊緣化”和“一體化”。“邊緣化”是指

的從 19 世紀的中心地位移至“側翼”；“一體化”則是把“歐洲統一”的古老觀念落到了實處。儘管困難重重，卻是本世紀的一大創舉，並與全球化的大趨勢相一致。一種跨國界的主權國家的聯合體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政治學和經濟學將是歐洲對未來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二、德國問題的解決。德國既對歐洲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又是兩次世界大戰之源。德國法西斯的興起和滅亡使德國，從而使歐洲，進入一個新階段。本書系歐洲分冊有專節論述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和思想根源，指出其興起在德國不是偶然的，而德國法西斯的最終失敗使至少是西部德國最終納入了西歐的民主進程，在制度上一致起來，使德國不再是歐洲的“問題”。至於冷戰中的德國分裂而造成的“德國問題”，其性質與以前的不同，這一問題以柏林牆的倒塌而結束。法西斯德國的失敗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權的垮台，而是一種思潮的終結，是德意志民族主義惡性膨脹到極點之後的消亡，從此德國與西歐民主國家步調一致，理順了關係，從根本上改變了 19 世紀的西歐格局（現在這裡那裡還有法西斯殘餘，基本上不會成氣候，無傷大局）。如果沒有德國的這一變化，西歐一體化的進程就沒有可能。

三、“第三世界”的出現：殖民體系瓦解，出現了一大批新獨立國家，構成“第三世界”。這一名詞有多重含義：最初指中立於西方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一批中立國家；毛澤東於 60 年代提出“三個世界”理論，主要用以劃分“敵、我、友”，既有政治標準，又有經濟標準，含義不十分明確；現在“第三世界”則泛指歐美以外的發展中國家。不論其定義如何，這無疑是 20 世紀後半葉出現的新

現象，它使世界地圖必須重畫，國際力量的消長有所改變，在某種程度上相對平等的國際機制有實現的可能。還有一項深刻的影響是在國際關係中置種族主義於非法。最後一點對人類思想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間的弱肉強食還常常是以赤裸裸的種族優劣論為理論基礎的。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固然如此，歐美民主國家對待“非我族類”也是如此。本書系美國分冊專有一章論述種族主義，實際上這不限於美國國內而是帶有世界性的。所以二戰之後種族平等成為一項國際公認的原則應看作不但是國際關係史上而且是人類思想史上的深刻的革命。

四、核武器的發明：這是科學理論和實踐的劃時代的飛躍的產物，這種發明用於製造殺傷力空前強大的武器，並非科學家的本意。核武器既是毀滅人類的威脅，又是制止世界大戰的因素。整個下半世紀各大國都在為對付這一自己創造出來的怪物而傷腦筋，核軍備競賽與核軍備控制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個主題。

五、“信息時代”：這是計算機的發明、完善和普及的結果。這一名詞最引人注目地被接受是從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發表開始。以後又發展到“網絡時代”。“後工業化”這一名詞在 60 年代就已出現，但是“後”以後是甚麼，當時還不明確，現在基本上達成的共識是稱之為“信息時代”。這也是與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一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與前面發展不同的是，這一次是席捲全球的，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有些國家能夠長期處於工業化進程之外。這一變化帶有劃時代性質，深刻地改變着國家關係、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犯罪模式。但是並不等於說各國和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可以縮小，相反，信息本身成為一種財富和權力，它一方面迫

使世界各國趨同，一方面又在世界範圍內成為擴大先進與落後，貧富懸殊的新的動因，這也是一個悖論。

六、國際協調體制化：這首先是指聯合國的出現，還有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的國際組織及其規則的確立。這一機制是建立在二戰後的新的國際關係和新的觀念的基礎上的。例如“集體安全”的觀念，戰前就難以成立，威爾遜的國際聯盟的失敗從根本上講是當時條件尚未成熟。這種國際機制的出現也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是和平不可分割，市場一體化的現實需要，也是對人類休戚相關的承認。這與下面要講的美國霸權既矛盾又一致。聯合國及一系列的國際經濟組織實際上都是美國發起，並在美國“領導”下制定規則，然後由成員國討論通過的。但是一旦通過，就屬於所有參加者。儘管在組織內部仍然存在發言權和實際決策權的不平等，但是終究與沒有這樣一個組織大不相同。聯合國自成立以來在維護和平、調節爭端、監督國際協議的執行、解決難民、貧困、衛生等遍及全球的問題方面作出了無可代替的貢獻。美國一方面在其貢獻中佔最大分額；一方面，也利用這些國際組織實施自己的霸權，甚至在不能操縱時撇開它行事。這一現象還將繼續。一個有強制力的世界政府尚屬不可祈及，但是目前的國際機制不論有多少局限性，還是能對強權政治有一定的制約，隨着國際間相互依賴日益緊密，這種機制只能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而不會倒退到無序狀態。

七、美國霸權：現在有多種提法：“美國領導”、“美國世紀”、“美國治下的和平”、“美國霸權主義”，“超級大國強權政治”等等。歸結到一點，就是美國在 20 世紀崛起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國，冷戰結束後

又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對於全球所產生的影響，本書系美國分冊的最後一章討論了這一問題。下面還將論及。

## 民主與霸道

在有關美國的對外行為中，作者用了一個提法就是美國“對內立民主，對外行霸道”。就是要強調前面所論述的源於美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內部的民主制度和漸進的改良精神與它的國際行為並無必然的聯繫。美國任何當政者在國內必須受制於一整套制衡機制，在國際上卻駕凌於一切規則之上，包括它自己參與制定的規則。它憑藉超強的實力軟硬兼施，迫使他國服從其戰略利益，甚至不惜大規模動武，這就是“對外行霸道”。

在我國相當普遍的認識是，一個倡導自由，奉行民主制度的國家理應在國際上也遵守和平和公理，否則就說明所謂的民主自由都不足取，或者說都是假的。甚至於把我國應走甚麼道路，提倡甚麼原則與有關國家如何待我聯繫在一起。一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在這個問題上有難以分解的情結，導致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曲折道路。對這種心情最生動地概括是：怎麼先生老打學生？於是決定轉而以俄為師。但是結果如何呢？姑不論後者的榜樣如何，這位老師難道就不欺侮學生了嗎？平等待我了嗎？時至今日，應該可以對這個問題作理性的、客觀的分析，認識到，首先自由民主是一種思想理念，為人類共同的財富，代表文明發展到某種程度時人的共同的追求。它雖然肇始於歐洲，卻非哪個國家所專。這種理想付諸實踐要有一定的條件，需要長期的發展過程。各國所處環境不同，當然過程各異，難

以強求一律。另一方面，到目前為止，國際事務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佔主導地位，也就是為強權所主導。不過 20 世紀畢竟與 19 世紀有所不同，前面諸點已經提到。當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是強權政治的實行者。與其說這反證了民主自由之不足取，毋寧說正因為這些國家對內有一套足以使其富強的思想和制度，才有資格在國際上稱霸。這裡是講客觀事實，並非提倡凡國家強大必然行霸道。但是如不富強則不論稱霸還是主持正義抵制霸道都沒有力量。我們的祖先一個半世紀之前已經承認了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優越性，但是對於深層的探索，似乎始終走不出作繭自縛的怪圈。歷史包袱太重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在認識上總是把我們自己的追求與國際關係的起伏連在一起，有很大關係。

## 關於全球化

“全球化”的進程非自今日始，有的論者認為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就已經開始了。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就必然帶來全球的擴張。但是這一提法成為全世界的流行語卻是冷戰結束以後的事。二戰以後貿易、投資、生產、金融的國際化與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全球化成為新的現實，而冷戰的結束最後打破了人為的壁壘，同時高科技的發達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使每一個國家都不能自外於它。在許多方面人類真的到了休戚相關的地步，對他人的苦難既不能坐視，更不能幸災樂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前因後果和國際社會的反應是對此最好的註解。毋庸贅言，全球化的動力來自高科技發展本身的趨同力和現代市場經濟的擴張。和在一

國內一樣，它所到之處帶來巨大的發展，也帶來巨大的問題和矛盾。其中至少有以下三個突出的問題：

1) 全球範圍內的兩極分化。根據最新的聯合國的調查結果，全世界最富有的三個億萬富翁的財產，加起來已經超過了最不發達國家中六億多人口所擁有的財產。而這種荒唐的不平等現象正是時間縮短、空間縮小和邊界的消失的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一國內的問題可以通過政府干預進行改良，而在世界範圍內沒有可比的機制。在所謂“贏家通吃”的規律下，一些國家和民族可能境遇更加悲慘，有些國家被淘汰出局，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2) 民族主義的突起。冷戰結束後被意識形態掩蓋的民族主義突顯出來，紛爭不已。關於民族主義問題，本書系幾個部分都涉及到。最後一部分討論了它與全球化的關係。應該說，民族主義是民族感情及其政治化的表現，是與民族的誕生俱來的一種本能，因此往往不是很理性的。民族國家起源於歐洲。歐洲國家經過了幾百年的爭戰、磨合，各民族的要求得到充分的釋放，民族利益大體上達到平衡和滿足，才有今天聯合的可能。另外，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高度並大體相同是重要條件。但是有少部分民族矛盾並未得到解決，各自的歷史願望並未得到滿足，因而還在繼續爭鬥不已。冷戰時期暫時被更加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分野人為地壓制下去或加以掩蓋，一旦這個蓋子揭開，原有的紛爭就變本加厲地爆發出來，甚至惡性膨脹。蘇聯的解體也與此有關。至於歐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區，其民族願望長期受壓制，剛剛有機會得到伸張，發展極不平衡，歷史遺留的矛盾和問題極為複雜，自然就要頑強地表現出來。而況大多數情況還有大國強國的利益和野心捲入其中，使問題更加

複雜。

3) 霸權主義的伸張。在對峙的一方失去抗衡力量後另一方更加肆無忌憚。在世紀末到來時霸權主義與民族主義同時集中體現在巴爾幹地區的烽火中。

關於全球化，當然離不開美國。毋庸諱言，美國以其科技、經濟和制度的領先地位“領導世界新潮流”，也就是在全球化中起主導作用，這是客觀現實，不以哪個國家的意志為轉移。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或“智能經濟”中，美國比在工業經濟中更佔優勢。除其他條件外，作為獨特的移民國家，在全世界人才自由流動幾乎無國界的今天，最優秀的人才流向美國勢不可擋，使美國在這方面形成絕對的良性循環。全世界在不知不覺中追隨美國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影響。這是一種無形中的“美國化”，連歐洲也不例外。理論上各國有主動權，迎之拒之操之在己，不少國家也制定了許多保護民族“特色”的政策。但是實際上在市場一體化的潮流中，在相當程度上是身不由己的。特別是後進國家，面臨兩難抉擇：盲目追隨當然不足取，而過分強調民族特色則可能保護落後，自外於世界潮流。這種“領導”對世界是禍福相倚，不可一概而論。幾百年來，美國對人類並非沒有作出過積極貢獻，今後也仍然應該而且能夠對人類共同的問題擔負義不容辭的國際責任。但是，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上也可以起極大的破壞作用。

首先，它所領導的“新潮流”不等於“好潮流”。全世界身不由己地追隨的榜樣未必是好榜樣。一種情況是促使西方文明發展的諸多優秀傳統正在發生異化，例如自由競爭帶來的貪婪自私；新聞自由轉為不負責任、散佈偏見，甚至助紂為虐；高度實用主義造成的文化庸



俗化，還有高度浪費的消費習慣等等；一種情況是本來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任何一種文明都是精華與糟粕並存的，對外人來說，吸收精華需要進行艱苦的努力和具備吐納的能力，而以不可抗拒之勢瀰漫於世界的卻往往是糟粕部分居多。更重要的是美國憑藉實力在全球進行合乎自己利益的戰略部署，要求世界各國服從其戰略，也就是如布熱津斯基的書名所表達的，把世界作為它的“大棋盤”，其他的國家被當作棋子。這是傳統的強權政治，也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強國所習慣的行為和思想模式，在方今國際關係中仍佔主導地位。近年來，所謂世界“多極化”之說甚為流行。但是客觀地審時度勢，這最多是代表一種主觀願望，或者一種未來可能的趨勢，目前還不能算是既成事實。試看哪一種力量可以稱為一“極”？歐洲、日本、俄羅斯各自都可能與美國有矛盾，但不足以與之抗衡，更不可能聯合抗美，而是相反，在他們之間有矛盾時，有可能各自藉助美國的力量，引來美國的干涉。這樣，外部沒有足夠強大的制約力量。內部人民的制約力量也在削弱——由於高度發達的武器可以避免出動地面部隊而不必付出人員傷亡的代價，這就難以使本國人民感到切身利益而形成反對的力量。在內外的制約因素都大大削弱的情況下，美國的干涉主義從理論到實踐將進一步發展。這是值得世人嚴重關切的。

### 新課題呼喚新思維

20世紀的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和大災難，誕生於19世紀甚至更早的重要思潮各自佔領舞台大顯了一番身手，在解決人類對發展和平等這兩大追求中取得了重大的進步，但是問題依然嚴重地

存在。老問題以新的形式出現，同時又出現新的問題。全球化是一種客觀的進程，不是哪個國家的主觀意願的產物。但是這一過程是否能給世界廣大人民帶來和平和福利，則取決於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和蠻橫的霸權主義這兩種力量能否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取決於在全球範圍內發展和平等的問題能否得到解決。此外，人類如何以自律的精神駕馭飛速發展的高科技也是重大課題。就以環境污染來說，這可能是 21 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之一，超過迄今為止的戰爭和平、貿易摩擦等等帶來的影響。不但地球上的水和空氣被污染，連天空、太空也正在以危險的速度被人類所污染。在這種情況下，下一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生死存亡問題將是自己親手造成的生存環境的破壞，這是不分國界的。明智的選擇應是聯合起來共同拯救和改善環境。但是發展的不平衡和環境的暫時差異，造成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和全局之間的矛盾。決策者不見得都那麼明智，即使是明智的決策也不見得能在盲目的群眾中貫徹。到那時真正的英雄可能不再是戰場上的軍人，或是以其他方式保衛某一個國家的局部利益的人，而是對保衛環境作出巨大貢獻和犧牲的人。如 1998 年戈德曼環境獎獲得者之一，以部族集體自殺相威脅來阻止西方石油公司在哥倫比亞雨林中開採石油的領袖，其英勇悲壯也可以入史詩。這只是例子之一。

總之，進入下一個千年，人類面臨的是如何使自己的高度智慧和創造力造福而不是加禍甚至毀滅自己。本世紀最後的十年的發展可能預示着一種質的變化。在思考世界面臨的問題時，也需要目光超越傳統的國際關係、地緣政治乃至意識形態的觀念。新課題呼喚着新的眼光和新的理論。本書系意在鑒往知來，希望能得出一些啟